

1-1-2011

## 导论

布雷特·麦考密克  
美国纽黑文大学

乔纳森·H·平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 [jping@bond.edu.au](mailto:jping@bond.edu.a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hss\\_pubs](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hss_pub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布雷特·麦考密克 and 乔纳森·H·平. (2011) "导论" *中国的参与：全球性的地区问题*, 第 1-11页 : ISBN 978-0-9806187-6.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hss\\_pubs/572](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hss_pubs/572)

# 导论

布雷特·麦考密克 (Brett McCormick), 美国纽黑文大学  
乔纳森·H·平 (Jonathan H. Ping),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张键 博士 译

国际关系中的平衡是一种幻想。与例外相比, 连续的变化更是常态, 只不过是这种变化的幅度和范围不同罢了。在二十一世纪, 权力的平衡将由快速和根本性的变化所定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于1862年在灾难性的美国内战结束时发表演说, 忠告道:

*安静的过去的信条, 对于暴风雨般的今天来说是不适用的。机遇由困难堆积而成, 并且我们必须随着机遇一起崛起。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 所以我们必须用新思维去采取新的行动。<sup>1</sup>*

这些圣人之言号召我们挺身而出, 重新思考和行动, 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今天, 就像它们曾经适用于林肯时代的美国一样。本书和多国安全专题研讨会系列正是为了应对目前全球暴风雨般的现状应运而生的。意外的是, 美国内战孕育出了一个伟大、繁荣而稳定的国家。具有类似特性的全球体系因此也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为此, 江泽民主席曾经建议:

*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和学习, 借鉴他人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从而实现共同进步。<sup>2</sup>*

来自我们目前风暴前线的第一波风雷就像二十世纪向二十一世纪交替之际一样。两个意义深远和地理上孤立的事件暴露了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深深的裂痕。1999年5月7日, 来自密苏里州中部的美国空军轰炸机向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投下了五枚炸弹, 造成了三名中国公民丧生; 2001年4月1日, 从海南起飞的中国海军拦截战斗机与来自冲绳的美国海军侦察机相撞, 导致中国飞行员牺牲。

这些事件和随后关于动机的辩论表明美国和中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因此相应的应对之策在新世纪里对于地区和全球稳定的重要性将是显而易见的。从2002年开始, 中国外交学院每年都会在北京举办为期一周的关于东亚外交和安全问题的研讨班。从2008年开始, 纽黑文大学的“全球研究项目”(Global Studies Program) 开始资助这一研讨班。

---

<sup>1</sup> 华盛顿特区, 1862年12月1日。

<sup>2</sup> 199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一年一度的专题研讨班最初是一个面向学者和官员的论坛，来自各个国家的与会者向同行们阐述那些本不应该被误读的信息。这种方式存在两种很明显的缺陷。首先，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以及在地区层面的接触网络，不能摆脱同地区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众多其它国家组成的同样复杂的网络。如果在研讨会上产生任何功能性的理解，那么他们应该包括来自美国和中国以外地区的参与者。其次，从理论模型到历史语境，到讨论所使用的语言本身都是建立在旧有的多元范式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些对机遇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如果研讨会的参与者愿意真正开始彼此间的对话，而不是忽略别人的观点，那么他们从个体意义上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体现出新意。

因此，每年专题研讨班都有新人参与，并且大都主要是来自亚太地区，主要讨论一些新的议题，这些新议题往往是地区性和全球性元素和维度的结合；并且采用逐渐超越旧式无效标准的新模式、研究方法和语言。这本书从跨学科的框架来探讨和中国相关的核心问题，是近来此类讨论的综合体。每一章都是对原有讨论的批判性调整，有时可能会出现明显争议。这主要是因为与会者个人发言很直率和坦诚。形成此类讨论对深层次参与非常必要，并且无论何种紧张的讨论都可以放在对话中，因为它们切中了分歧的要害，而不是像以前的讨论那样使得讨论者产生分裂。对于国际性对话而言，明确新的概念外延绝非易事，但是这却是形成有意义的共同基础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式。和扩展该研讨会受邀者名单类似，可以想象将来在北京还会增加新的研讨会。

布雷特·麦考密克博士（Dr Brett McCormick）和 乔纳森·H·平博士（Dr Jonathan H. Ping）作为主编构思了本书及论文的框架，并且启动了该书的出版工作。此次协作源自于和中国学者们探讨“如何重新思考我们世界的未来”这一问题时所激发的共同的学术探究、经历和互动。邦德大学出版社在论文集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讨论，该书的出版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利用了在北京和中国多年开展的实地研究成果。其次，该论文集跨学科的特征（参与该书的学者们主要是来自历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但又不仅限于上述领域）都在本书中得到了体现并使得该书受益。第三，有着国际背景但主要是地区背景的 authors 表示他们都主要关心亚太地区，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联邦。第四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研讨班使得参与者同中国军方、政府和学术机构有了独特而非正式的接触和互动。在此方面，中国的学者都得到了制度上的支持。正式的默认极具象征意义，尤其是 2006 年该研讨班的参与者作为第一批外国学者获邀参观中国外交部。

该论文集关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世界。该论文集是在与各位作者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统一文本，并且从多样化的或毫不相干的学术起点中得出独特的结论。由于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了验证、提炼、批判和修正，该论文集在准确性上得到了提升。该书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存在局限性，并且受到国内行为体和地方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的国际关系集中于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问题上以及那些将国际关系行为体吸引至中国国内和地区政策上来的问题上。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中国是个重要的世界性大国，并且将会继续塑造国际关系，就因为其人口、经济发展和政治特征的独特性。

出版这本论文集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因为它回应了当下的需求和学术界以及当代社会的学术需求。正如本书记载了将地区和全球问题联系起来的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它提出了独特而有力的论点，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这本论文集是国际合作的结晶，具有在中国实地调查研究和跨学科的背景。本书的基本结论认为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推动了中国的参与。但这并未得到中国的完全承认。为了朝着既定目标和平地迈入21世纪，中国必须有意识地从国内、地区和全球层面全面参与。中国必须从理论和文化上参与，并且必须创立统一的全球化的理解背景以满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目标。

本书包括导论、三大部分共七章以及结论部分。导论部分陈述了主要论点、结构和本书的目的。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外交和理论。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涉及全球性关切的地区问题；第三部分讨论全球和文明问题。结论部分概述了本书的一些新观点，将其与论文联系起来并且为将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一章是“历史在建构国际关系语境中的角色”，作为第一部分的开篇之作，是由美国纽黑文大学的布雷特·麦考密克博士（Brett McCormick）撰写的。第一章认为历史的语言同外交的需要基本上是难以协调的，应该从词类话语系统中系统地去除掉，或者是大幅度地减少。

虽然存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竞争性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利益导致了中国同其地区和全球伙伴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是没有正当理由允许不同的观点危害外交文书的效力。外交的基本规范是拥有共同基础和精准。在此情况下的共同基础不是共同利益，而是在讨论的各个论点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共同）观点。精准是关于建立互信的含义和内涵的，而这又是用来定义和描述讨论的各个观点的术语。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建立作者认为理解新问题合适的语境，外交文书的格式在历史的语境下已经越来越固化。但是，非但没有明确化，这些将语境历史化的努力反而适得其反。

本章将考察类比推理、国家身份的构成以及历史学科固有的主观解释分层的作用和意义。语言的构造、分析的视角，乃至历史特定的推理方法等大都与外交文书不一致。从理论上讲，在学术层次上，历史学家能够同时欣赏同一时期多重可能的叙述；实际上，个体的外交官（或者文件）通常植根于他们的国家立场。因而历史学家的语言也就和外交交流的需要正好对立。

第一章第一部分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简单例子，例如处处提及的长城和郑和的远洋航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隐晦的历史维度举出了例子（但是并未得到充分评价），例如“中国的崛起”，或者“屈辱百年”等修辞，或者最后将更复杂的历史维度嵌入台湾问题的“语言表述”中。本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通过界定三种典型的方式来管理这些问题的战略，这些典型的方式就是把历史置于反向效果。本章所导出的结论将具有特别的意义，并且与第三、第四和第七章相呼应。

第二章是“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哲学”，这一章由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的罗西塔·德里奥斯（Rosita Dellios）完成。该章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哲学这两者做了比较，作为一种视角来探讨中国作为崛起的21世纪全球性大国扩大国际参与所扮

演的角色。正如像20国集团这样核心的全球性政治集团所展示的文化多元性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家不再能假设世界将继续沿着西方式的思想构建前进（或者认为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章探讨中国的思想如何同国际政治体系的理念相协调，尤其是探讨两个首要的问题：作为在当代全球化的国际事务灵活性范围内的一种进程，这两者之间能有效地协调吗？两者如何进行主体间的互动？

本章证明了西方和中国传统的内部异质性，并且因此倾向于允许可通约性和共同理解的潜在可能性的方法论，这正如有时候它所表现的那样。此外，鉴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哲学基础，这两个体系的主体间性能够如期望的那样存在，从而表明了“文明的对话”可以推进更大范围的可通约性。最后，本章在方法论上认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这种观点主张国家不仅追求物质权力，也重视同观念权力（在第七章中以不同的方式阐述）的关系。由于国家看待自身及其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观点不一致，国际关系因此成为一种主体间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导致身份和行为的改变。

德里奥斯阐述了众多中国哲学流派重要的维度，包括道家、儒家、佛家、墨家以及法家等哲学思想流派，并且探索了它们和2006年第一次系统提出的中国“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融合问题。作为儒家全球治理思想最近的体现，它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交叉，融合成了全球治理层面带有儒家思想的世界主义形态。本章的结论用例子说明了中国参与的必要性，用地区和全球相关的维度，并清楚证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哲学在规范性软权力和机制构建领域产生功能化作用时，相互间都是最具创造性的。

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性关切的地区问题，共包括三章。第三章作为第二部分的开篇，题目是“郑和或郑成功？”，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安德鲁·R·威尔逊（Andrew R. Wilson）撰写。本章建议21世纪的中国海军应该像明朝的海军而不是像19世纪或20世纪的那样。过去两个世纪的经历主导着当代的话语背景，但是显得有点背离常规而不是去寻求相关的经验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分享着和明朝一样的海洋权力基础——相似的贸易模式正在形成，涉及的地理范围和15世纪及17世纪相同；中国目前在地区和全球贸易上的吸引力完全可以与当时相媲美；并且和明朝一样，中国目前仍然从根本上算是陆权国家。通过集中分析明朝初期和末期两种极端的模式，威尔逊阐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应该吸取的一系列经验教训。

第一个模式是15世纪早期郑和著名的印度洋航海，但是文章强调说郑和的航行和北京今天的一般表述有着显著不同。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这些航海活动的终止并不意味着从海洋根本性的转变，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国家对海洋直接干预的终止，并且意味着回到了试图牵制私人海事活动的政策。相比而言，17世纪郑成功（国姓爷）的模式是外向型海上安全的一种。此时的海上活动非常活跃并且被证明是阻止明朝最终崩溃的关键因素。海上活力和官员忽视的结合使得强有力的商业或军事力量不受明朝的控制。

通过评估这些极端模式和著名模式的优点，威尔逊从16世纪晚期的历史中提炼出了第三种混合型模式。明朝在16世纪70年代击败了倭寇的袭扰，以及16世纪

90年代在“壬辰倭乱”的战斗中击败了日本，明朝设法在陆地和海上，以及在海岸防御和近海防御中获得平衡，而这些都符合中国的战略地理。最后，威尔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应该从这些历史中吸取四点经验教训，包括全球性非传统海军使命和远洋海上通道保护，以及关于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地区问题等。

第四章是“台湾是中日关系的节点”，由美国纽黑文大学的布雷特·麦考密克（Brett McCormick）完成。本章指出，关于台湾的外交和政治问题一直处于中日关系的中心，因此使它成为研究为连接国际关系地区网络以及与之相重叠的全球网络而特别有启迪意义的案例。本章按照粗略的编年体顺序分析了从中国和日本1871年的第一次现代性接触一直到冷战时代开始这一段历史时期。麦考密克揭示了三个长期存在的动态点塑造了台湾作为东亚国际关系节点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指出台湾将继续构建地区历史进程。

第一个地区秩序内根本变化的动态关注点，例如传统的中国朝贡体系和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融合，日本崛起成为地区主导和中国衰退的同步进行，或者是冷战的产生。通过更充分地理解这段历史可以领悟到的经验教训将必定会与在当前及将来地区和全球秩序中参与可比较的转移中产生某种关联。

第二个动态点揭示了中国和日本的国内政治事务一直对台湾问题的进展有着出乎意料的重大影响，并且对中日关系的演变也随之产生影响。尽管全球化的许多模式界定了21世纪，但是国内问题仍将继续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演变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在每一个阶段，随着地区框架内更宽泛的改变，我们看到正在演化中的中日关系的稳定经常被叙述为国内政治关切的协调(或不协调)。因此，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关系的节点是一个典型的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相互交织的例子，如果能够成功参与当下和将来地区问题意义深远的挑战，那么这个节点在其充分展开时必须加以理解。

第五章是“石油、海上通道和安全困境”，由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的杰森·J·布拉泽维奇（Jason J. Blazeovic）撰写。这一章涉及到三个核心问题：中国打算如何确保连续而充足的石油供应；这将对东亚构成何种影响；并且这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本章中，布拉泽维奇穿插着对现实主义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原理的讨论，阐明了可能产生的潜在安全困境。他首先着眼于中国石油战略的地区影响并将其扩展至更广范围内的全球性意义考量；尤其强调了同日本、印度和美国的的关系。

通过探索能确保在脆弱的海上通道中保障连续性能源供应的战略，中国采取了雄心勃勃的积极防御和离岸防御的军事和外交战略，从而将中国的安全边疆扩展到了东亚以外的区域，并与全球性利益范围交织在一起。布拉泽维奇假定这就导致螺旋式的不稳定安全困境产生的潜在可能性。由于存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石油市场不信任感的阻碍，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开发其他的缝隙市场，例如非洲；同时增强确保通过印度洋的地区性(并且现在也包括全球性)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在非洲的供应安全很成功并且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石油进口仍然面临

威胁。但是他们会将国家战略努力的方向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布拉泽维奇认为中国大陆强有力的海上安全边疆的关键是与台湾实现统一。外界对中国在东海和印度洋的跨国部署存在重大疑虑。从军事角度看，因为日美同盟和印度美国同盟关系，日本和印度海军力量的存在以及自身海外军事能力不足等，中国感到在东海和印度洋上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利益存在的地方，也是其军事能力必须存在的地方。根据分析中采用的现实主义原理，这些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刺激着来自其他国家的危险反应。尽管中国和日本、印度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将会继续沿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路径演化，但是透明性和信任机制建设合作正在逐步增强。或许这些发展能够成为朝着承认东海以及印度洋海洋通道是作为国际公有海域而不是战略竞争通道的重要一步。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包括两章，主要涉及全球性和文明问题。第六章是“中国发展水平”，由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的乔纳森·H·平（Jonathan H. Ping）撰写。平采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一般原理，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担负更加积极的责任并且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中国既是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温和霸权国。

在20世纪晚期，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一个国家同其国内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转变成了单一国家和全球市场之间的共生关系。此类改变显著的结果就是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逐渐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相协调。中国的结构性权力必须相应地和世界秩序相适应。本章的核心就正好分析了这种进程该如何推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现在并不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主要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关系或能力去做出重大的改变。中国现在存在“国家-市场”共生关系，而不是全球化中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国家-全球市场”关系。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内政策的外部效应将会最终影响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另外，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中国并没有扮演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角色，或者满足外界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期待；也没有在非政府组织中提升其规范和价值。为了在中国和全球化世界秩序中增强一致性，这些领域必须被明确指出。

中国能够鼓励世界秩序适应其结构性权力。中国有着重大的权力资源，并且因此也有潜在的权力能力去追求改革并为了所有民族国家的利益去追逐国际发展和重新创造全球市场。中国潜能的根本部分源自其为全球提供政治和公共产品的大国能力。中国的规模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是全球性的。当追求这些利益的时候，这些国内政治有着国际影响，因为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利益，而这在功能上讲是全球公共产品（GPG）或虚假的全球公共产品。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理论上处于边缘的位置，并且因此游离于发展的政治之外。处于核心位置的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发展经常被质疑是剥削，并且因此受制于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学理关注。

但是也存在障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有序性原理——民主、自决和人权

——是目前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取权力的障碍，但是它们并非不被承认或难以超越的。中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同等重要的障碍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霸权的理解。他们历史的经验和中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主义的语境正在影响着对于霸权的叙述，并且因此限制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国际发展的贡献。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为了政治和公共产品和虚假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为了再创造和维持全球发展，需要权力和中国的决心去行使其固有的能力。

平因此将一种在国际发展中增强的角色界定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为理想的功能。中国被独特地定位在一种角色中，认为中国由于其作为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独特的特征而充分利用了本世纪最好的机会。她有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这也正是她能向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所能提供的。这弥补了这样一种事实：发达的大国不具备同样的能力因为它们已经是发达国家，并且利用西方跨国公司是有争议的因为存在导向核心外围剥削的脆弱性。为了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为国际发展影响宏观改变，通过中国独特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向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提供政治和公共产品作为虚假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它能够，并且必须成为良性的和仁慈的霸权国，作为重新定义通过国际发展的观点。

第七章是“历史的螺旋式演进和中华文明的复兴”，由中国外交学院苏浩教授（Su Hao）撰写。为理解全球背景下中国的演进历程和苏浩教授提出的国家的地区和全球体系的历史再平衡的深层意义，本文提出了典型的中国式理论路径。苏浩教授赞同通常的对当代的一般性叙述，这种观点认为伴随着历史延续性的中国当前的崛起将逐渐回归到力量和稳定，而这种历史的延续是由辉煌的过去和被卷入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屈辱时代组成的。这种开头作为一种叙述方式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士都很熟悉，它迅速地扩展至一个更宽广的分析框架中，这种框架由大多数西方学者几乎没有共鸣的辩证推理构成，但是如果意见一致时这种分析框架必须被重视和理解。

从自然法则超越国家主观意志的影响并引导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这一假定开始，苏浩教授将物质生产力认定为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将国家权力界定的关系视为塑造世界秩序的力量。

这些观点构成了本章的两个中心假设：第一，全球秩序的演进伴随着历史发展的长期轮回；第二，这种轮回的本质是螺旋式发展的一种。螺旋式发展代表了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在权力的特定不平衡中将会周期性地回归平衡，但是仍将在源自新生产方式和价值产生的再平衡中保持先进，而不仅仅是向旧有体系的回归。

在结论部分，苏浩教授认为随着中国重新确立其在东亚正当的地缘中心位置，如果历史螺旋式的发展在事实上促成了全球秩序的再平衡，那么中国的复兴预示着中华文明相应的复兴。这就意味着人类发展终极状态的主导性价值体系也将会脱胎于中国模式，在能尊重和适应时代新平衡的和谐社会中超越旧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念。



本书独特的优点源自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通过从若干学科展开讨论和分析的互动和罗列，例如外交学、历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以及安全研究等，我们才能够充分说明中国参与世界事务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此外，本书把传统的西方和东方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为全球性话语奠定了独特而新颖的基础。这些观点和方法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争论，每一章节所展现的主题和思想都在其他的章节中得到了呼应和补充。尽管每一章节都能单独自成体系，但是整部书的协同效果远远大于各个部分之和。这本书是迈向新的思考和行动的重要步骤。但是，每章都清楚地指明了摆在前方的宏大任务。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出了重大挑战，但是也为那些在我们这个暴风雨般的时代迎接挑战的国家扩展了广阔的潜力和回报。

-----

乔纳森·H·平，B·麦考密克：“导言”，载 B·麦考密克和乔纳森·H·平编，《中国的参与：全球性的地区问题》，罗宾娜：邦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11 页。